

西安城墙 史话

张贵沸·景慧川·编著

94.11

陕西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群宝
装帧设计 魏明道
版式 田慧瑒
校阅 裴兆雄

西安城墙史话

张景涛 景慧川 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彬县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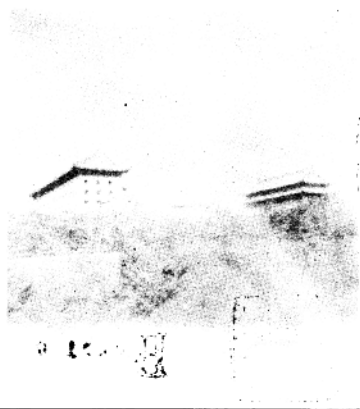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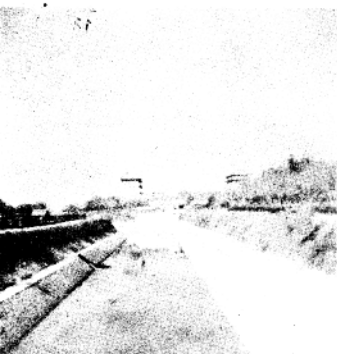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1/32开本2.75印张4插页5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

印数：1—20,000

ISBN 7—5418—0012—0/G·10 定价：0.60元





目 录

一、城墙的起源和发展·····	(1)
1、城墙的起源·····	(1)
2、城墙的发展和分类·····	(6)
二、西安城墙的来龙去脉·····	(13)
三、明代西安城墙的建筑构造·····	(24)
城河、城门、瓮城·····	(26)
月城城楼、大城城楼、角楼、敌楼、 魁星楼·····	(31)
城墙、马面、登城马道·····	(36)
四、清代改建后的西安城墙·····	(43)
五、民国时期对西安城墙的增新补旧·····	(53)
六、西安城墙在实战中的屏蔽作用和破坏 状况·····	(56)
七、明清两代守卫城墙的兵防武备·····	(62)
八、未来的“立体公园”·····	(73)
附编 国外城墙掠影·····	(77)

一 城墙的起源和发展

1、城墙的起源

“城墙”一词原是从“城”字引伸而来，“城”按《说文》解释，是“盛”的通假字，“盛”意是纳民，所以“城”字的本义是筑土围民而成国，由此引出“城墙”一义。唐朝著名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一诗中，“黑云压城城欲摧”里的“城”就指“城墙”而言。被誉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万里长城”的“城”字，也同样是“城墙”之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字又包含了今天的“城市”之义。

城墙，是人们为防御外来侵袭所修造的自卫设施。它的出现，跟人们的定居生活紧密关联。

远古时期，人们从流动的狩猎生活转向原始农业劳动，有了较稳定的居住区。但“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五蠹》）。要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于是，人们在深沟危壑的启发下，在居住区周围挖掘深深的护卫壕沟，截断禽兽的路径；又取巉岩绝壁难以攀

登的长处，在居住区外，用天然石条或黄土垒筑高墙，阻止虫蛇的袭击，人为地创造出一个安全带。正是这简陋的原始防御措施，孕育了后代雄伟的军事防御体系。

考古发掘证实，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上，多建有这种防御设施。西安半坡村遗址上就发掘出一条环绕在居住区外的、深宽各五六米的护卫壕沟（《考古》—1962年第9期），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上残留着垒土围墙（《考古》—1962年第9期），内蒙古赤峰东八家石城遗址周围存留着一段用天然石条砌筑的壁墙（《考古》—1962年第9期）。除此，在辽宁西部、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新石器遗址上，都留有围墙的遗迹。

这些事实说明，建设本部落的防卫设施，确是各民族的一项重要工作。与后代不同的是，它的指导思想是防禽兽虫蛇，而不具军事目的。

城墙是随着私有制的建立开始出现的。传说夏朝就开始“筑城以卫君，建廓以守民”（《中国城市建筑史》）。

说起夏朝建城，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夏王启，有一条心爱的黄龙坐骑，启常骑它上天宫与诸天神谈论治国之道，返人间向他的臣民传达天帝的旨意。不知过了多少年，黄龙老了，再也无力腾飞了。当它快要咽气时，启非常伤心，抚摸着龙头泪流不止。黄龙偎依着他，说：“我的主人，你不要伤心。我死后，你把我的身体盘成一个方形，你住在里面，我

的灵魂将永远护卫你的安全”。黄龙说完就死去了。

启遵照黄龙的遗言，把它的身体盘成一个方形。第二天早晨，启从他的屋里走出来，只见昨天盘放黄龙身体的地方，出现了一座高大雄伟的城垣，上面还建有一座凌空高耸的城楼。这城垣、城楼气宇轩昂，那形状，隐隐地显出那心爱的黄龙的身影。

启非常高兴，立命臣民在城垣里修房建宫。宫殿建好后，启和王族全部搬进去居住，他在高大城垣的保护下，平安地度过了执政期。

此后，历代国王都仿效启，修筑高大的城墙，保护自己的安全。

事实上，稍具规模的“城”都只能出现在阶级社会诞生之后。因为只有发展到奴隶社会，才有可能动员较多的人力物力；而筑城的主要目的又是为了统治者的安全，所以城墙自一出世，便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上面的故事虽然只是个神话，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墙的这一属性。

作为文字，“城”字最早出现在周朝的金鼎文中，写作“𨛵”（《篆字注释》），左边的“拿”是一座完整的，建有城楼的封闭式城防工事；右边，是一柄意象化了的古代兵器——大斧头。古代斧头代表着权力和武备。这个“城”字活生生地体现出古代城墙的军事目的与作用。此时营造防御工事的指导思想，已是以防人为中心了，并公然地成为私有制的保护象征。

城墙的军事作用是保卫私有制，而在意识形态

方面，城墙的形体规模，又是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的严格体现。

春秋晚期齐国官书《考工记》中，对依尊卑位份而定的礼制营城有严格的规定。

首先，城以大为贵。城分三级，王城为最高等级，“方九里”；诸侯次之，“方七里”；卿大夫采邑为第三级，“方五里”。其次，城隅以高为贵。王城高九雉，（一雉等于一丈）（《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P.66）诸侯城隅高七雉；卿大夫采邑城隅高五雉。再次，道路也按九、七、五排列。这些制度任何人不得变动，如若违背，就犯了僭越罪，立斩不赦。

然而营建城池的工程又是负有荫庇万世之贵的伟业。所以古人建城时，除须尊人主之仪外，还要祭乾坤，尊“天意”。这种崇畏上天的思想，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显得那么愚昧、可笑，但在对客观世界没有科学认识的古代，“顺天意而为之”则是一桩无比重要、非常严肃的大事。《诗经》里曾赞“天”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以莫。”在冥冥中监观众生的“天”也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他制约着下界芸芸众生今生来世的生死富贵。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因而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无论做什么事，都先要卜问天旨方敢行事——营城，则更应如此。

在西安建都的第一个王朝——西周，曾留下营造都城时占卜问天的记录，“考卜维皇，宅是镐京，

维 龟正之，武王成之”（《历代宅京记》P.5）。

观星象是古人考察天意的另一种方法。古人以为，县城合斗垣上应天市，星辰的排列、移动都是“天”向下界表示的某种旨意。并把二十八星宿，自西向东，以七个为一列，排成四组，名之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用这四只神兽掌管天的四极，预报凶吉祸福。隋文帝开皇二年，散骑常侍庾季才曾奏报文帝，曰：“臣仰观天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文帝听后，愕然半晌，叹曰：“天道聪明，亡有应征”，遂发诏营建新都大兴城（《西安府志·卷一》）。

到具体破土开工建造城池、宫殿、房屋时，古人又依据由五行八卦混合一体的术数——堪舆法（俗称“阴阳风水”）来施行。这种把五行的西金、东木、北水、南火、中土与八卦的乾天、坤地、坎水、巽风、艮山、兑泽、震雷、离火相配合，测量建筑物方位、型体，并以此来推算居主后世命运的方法，有着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它在中国古代建筑行业影响极大。

从城墙的起源一直到后来的发展成熟，尊天意合阴阳守法度是一条通贯始终的定律，统治者依照这个定律，大肆营造城池，用它来保卫自己，喧示国威。

2、城墙的发展和分类

城墙的发展与分类，可分别从纵横两个方面归总。

纵向归总，可以把它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一、原始社会的简单阶段；二、奴隶社会的成长阶段；三、封建社会的成熟阶段。

简单阶段，起于新石器时代而止于夏，历时一千年左右。这个阶段还没有“城”的概念，修建在居住区外的土墙石壁只能称为“墙”。

成长阶段，从夏代起到周代止，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国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化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王的宝座下，是用宗法等级制建设的，由各级奴隶主支撑的覆斗式的统治大厦。原始公社时期那种平等互爱的温情时代，象东流江水一样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两大阶级间明显悬殊的物质上的贫富差别和不可调和的精神上的仇恨。

奴隶主在阡陌纵横的井字形领地上，一方面为自己高贵的身份和拥有大量的私有财富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又在寂静的田野里感到了奴隶们那深沉的仇恨，于是，奴隶主便按自己的身份、等级营造保护自己家族安全的城邑，因而，这一阶段是奴隶主城邑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城墙营建规模是宗

法制度的体现，有鲜明的等级差别，带着浓厚的私家营垒意味。

这个时期城墙的建造型式，从《考工记·匠人》（《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营建王城的法式中可窥见一斑。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墙厚三尺，崇三之。城隅之制九雉，困窳仓城，逆墙六分。”以这法式来看，王城长宽各为九里，每边墙开三座城门，全城共有12座城门。城墙厚三尺，高九尺。城墙四个城角各高三丈，上建角楼。陡立的城角，成为城防的屏障，增强了城墙的防御能力。逆墙就是女墙，“逆”是建筑术语，表示斜度收分，逆墙的高低尺寸是城墙高度的六分之一。

以上营建王城的法式仅是书中记载，实际中营城的情况，夏朝仅有传说，无据可考。商朝，从1983年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发掘出的商汤早期都城——西亳城垣遗址看，当时墙体用夯土板筑而成，厚18米，可城门洞却仅宽二米左右，按这种不成比例的式样推断，城门上还没有建城楼（《人民画报》1985年第6期）。

商朝城墙外部一般都挖有环城护壕。如：1974年考察商代的盘龙城遗址时，就发现城垣外有宽约十米的壕沟。

周朝，是这阶段的鼎盛时期，特别是瓦和砖的出现，基本上结束了“茅次土阶”的建筑状况，城上也建起了高大的城楼，这已从金鼎文的“城”字

上清楚地反映出来了。

成熟阶段从春秋战国开始，直到清朝，历时2600多年，属封建集权制营城阶段。特点是：军事、政治、经济三要素同时成为营建城池的考虑条件，城墙本体随着武器的发展，型体构造逐渐改进、完善、定型。

这阶段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春秋战国开始，到元朝止，是城墙结构成熟前的过渡时期。

在社会发展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此时城墙建设中的飞跃是冲破了宗法制的营城典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臣强君弱的政治变化，原来等级森严的宗法营城制，被强臣视若罔闻，诸侯们根据自己的力量和需要违制修筑城墙，兴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高潮，这是当时“礼崩乐坏”的新政治局面的产物。此时，齐国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提出了一套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意识的城市规划理论，集中体现了第二次建城高潮的政治趋向。书中首先彻底推翻了体现奴隶主宗法等级制的城邑建设体制。旧制中王城及诸侯的城池称“国”，卿大夫采邑称“都”。而《管子》书中却是以城市大小、居民的多寡为标准划分城市等级，即所谓“万室之国，千室之都”，赋予城级以新的内容。其次，在具体的城建规划上，《管子》以“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为指导思想，强调按职业划定居住区，废弃旧制中按阶级划地聚居的规定。这既标志着阶级关系的新变动，也反映

了封建城市经济的需要。第三，在选择建首都城池城址上，与旧制中以井田制为基础的“择中论”相悖，主张“因天材，就地利”，“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总结了选择“国都”地址的经验教训，反映出新兴地主阶级重实际、轻形式的思想观念。

齐国的国都临淄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人口集中、经济繁荣的大城市。临淄城原属第三等级的卿大夫采邑，旧制规定只准“方五里”，到战国时期，齐国势力日益强大，问鼎之心渐盛，原“方五里”的小城远不能满足做国都的需要了。于是，齐国便根据自己的需要，大胆地扩建了城池，与周天子分庭抗礼。齐相晏婴在出使楚国时，曾向楚王描述过临淄城的景象：“城中车毂相撞，行人摩背，挥汗成雨，呵气成云。”一派盛世丰年的情景。除临淄城外，燕国的下都，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城都是当时的大城市。

新兴阶级的崛起，掀起了扩城的高潮，但诸侯的强大、争雄又挑起了频繁战争。由于这时冶炼技术比较发达，制造的武器种类繁多，威力大，因而，城墙的厚度和高度都有变化。考古证实，洛阳涧滨东周城垣，旧城厚度只有五米左右，到战国时加厚到十米以上，重要部位甚至加厚到15米（《考古记营国制度研究》）。

西汉初年，北方边境居住着强悍的游牧部落

——匈奴。他们乘汉政权初建兵力不足的机会，常在边境侵犯、骚扰，是汉朝的主要外患。为加强边境的军事防卫，阻止匈奴入侵，文帝在位时，晁错曾对边防建设献策，说：“为之高城深堑，具礮石，布渠答，复为一城之内，城间百五十步”（《考古》1961年第6期）。晁错主张建的边城，实际上是“回”形城。一城之内筑曲折迴环的城墙数道，每道城墙都有壕沟相间，城门交错，门内还设机关暗道，不熟悉情况的人，猝然入城，必定迷失方向，最终为守军俘虏。“回”形城的防御功能比普通城强，因而，晁错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刻得到文帝的赞赏，马上就在边防建造推行。此后，汉代边防的重要关口就都筑成“回”形城。1961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塔布秃村就发掘出了一座这样的汉代“回”形城遗址（《考古》1961年第6期）。

汉代边防的防御网一般是“三里一燧，十里一屯，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中国城市建筑》）。易守难攻的“回”形城，通常建在重要的隘口关道，同其他防御点组成完整严密的边境防线。

“回”形城在边境上沿用很久，直到辽金时代还在广泛使用。1959年在牡丹江林口县发掘的金代通城遗址，就是“回”形城，只是城门的修建比汉朝又有发展。每座城门分里外两道隘口，隘口之间用曲折的甬道相连，甬道两垣的高度不低于内垣。当地人把这种城门叫做“转角门”、“三环套月门”，其

防守能力较汉代更为严密。

到曹魏时，城墙建设有了里程碑式的飞跃。魏都洛阳城的西北角，建了一座堡垒式的金墉城。虽然它仍是夯土板筑而成，但在城墙外侧，创造性地修建了突出墙体的墩台，城隅修建了角楼，城顶外沿修建了女儿墙。墩台、角楼、女儿墙这些城墙上军事设施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城墙的战斗作用和防卫能力，也反映了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

唐朝的边防城墙，出现了保护城门，延长城门防线的瓮城（《考古》1982年第2期）。瓮城的出现，缓解了城门遭火攻的威胁。

城门普遍建造瓮城是从宋朝开始的。宋人用火药制造火器，并大量用于战争，城门首当其冲成为整个城防的薄弱环节。因此，宋朝不仅边防城墙修瓮城，内地的城池一般也都筑瓮城，重要的城池还加筑三、四道瓮城。

元朝是“过梁式”城门向“券拱式”城门转变的过渡时期。1969年在拆除北京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包裹在其中的元大都和义门及其瓮城遗址，处处可见过渡痕迹：门砧石上留有铁“鹅台”（承门轴的半圆形铁球），砖券只用四层券而不用伏（券是竖砖，伏是丁砖），四层券中仅一个半券的券脚落在砖墩台上，说明砖券技术未完全成熟（《考古》1982年第2期）。

后期，从明朝到清朝，历时592年，为城墙建

设的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全国大小城市普遍修有城墙，马面、女儿墙、角楼、垛墙、敌楼、箭楼、城楼、闸楼、吊桥、瓮城等城墙上的附属军事设施，已成为城墙构造的定格。

明朝对城墙的最大改进，一是用砖砌墙面，增强了城墙的坚固性；二是改变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木构过梁式城门为砖砌券洞式，城楼也变为直接砌筑在砖面的城顶海墁上。以砖代木，有效地防止了火攻城门的威胁，大大提高了城墙的防御能力。

这个改进，标志着我国的城墙建筑已完全成熟了。

从横向归总，城墙的建造可分军事城堡和普通城池两大类。

军事城堡，以守边、保卫疆土为目的，因而，防御严密为其突出的特点，一般都筑有附属军事设施。

普通城池，特别是都城的城墙，以显示国威为重要内容，雄伟、威严是它的特征，一般不建军事附属设施，但城内筑重城，城墙厚大敦实，尤其城门建造得特别壮观。汉长安城的城门全是三道观，唐长安城的正南门则筑有五道观。雄伟宏大的外形，从精神上造成一种威势，使人肃然起敬。